

“狮子在北京”

关于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的点滴回忆

韩琦

白佐良 (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 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令人尊敬的学术前辈，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中国和欧洲（特别是意大利）文明的交流史、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自从1994年有幸与白先生相识，此后多次在欧洲相见，得到他的教诲和关照，聆听他风雅的谈吐，感受到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实是我人生的幸事。今年是白先生百年诞辰，在此我谨简单回忆与白先生的交往，以及他的论著对我研究的影响，聊以缅怀这位慈祥博学的长者。

199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和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白佐良先生应邀参会。当时我旁听了这次会议，得以与先生相识。那次研讨会，我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德国学者柯兰霓 (Claudia von Collani) 博士，此后我们保持了长期的学术交往。

在这次会议上，白佐良先生首先致辞，他事先将准备好的中文发言稿给大家。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一开头就说：“条条道路通北京”（借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成语），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让在座的中国朋友感到十分亲切。会后我和白先生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因我对卫匡国早有研究，也曾曾在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读过卫匡国的著作（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以交换的形式赠送给国家图书馆），谈话中我将此事告诉白先生，白先生听后十分高兴，约我在会后陪他同去图书馆看书。

那天我们如期在文津街见面，调阅书籍之后，白先生在北海公园东侧的一家小饭馆请我吃饭。饭前白先生告诉我，他吃饭不多，因为胃做过手术。席间我们相谈甚欢，他深情回忆了初次访问北京的故事，及对旧城的美好印象，也感叹每次来北京，老城改造，变化太大，不免伤感。他仍沉浸在年轻时对北京的美好回忆，也提到在杭州西湖的良辰美景，特别提到了孤山旁边的小苏小墓。他还讲述了年轻时在南京时的一些故事，以及交往的友人，特别提到了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明史专家牟复礼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教授。白先生与牟先生相识，多有交往，不过有一件事令白先生颇为不悦，白先生开玩笑说：“这个美国佬，借了我的线装书，后来也不还。”白先生讲话时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还提



▲ 1946年，白佐良先生在南京
▲ 白佐良先生、夫人黄美琳和白龙(Bruno Bertuccioli)先生
均白龙先生提供

到他与著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 的交往，提到有一次他拜访高罗佩，看到书架上有一本雕版图谱，就很好奇，伸手取来看，高夫人看到了，连忙说：“此书不好，不能看不能看！”（聊以一笑）

1997年春，应 Napoli 东方大学 M. Fatica 教授之邀，我第一次踏上令我梦寐以求的意大利，参加纪念马国贤 (Matteo Ripa) 的国际会议，有机会与先生再次相会。在那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很多意大利学者，包括马西尼 (F. Masini) 教授，还有美国的孟德卫 (D. E. Mungello) 教授，会议期间也与白先生多有交流。会后，感谢美国旧金山大学马爱德 (Edward Malatesta) 的帮助，有机会在罗马停留一个月，访问了罗马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亲身感受了查阅档案、破解历史之谜的快乐。

在罗马期间，白佐良先生热情地为我撰写了介绍信，并专程陪我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办理手续，介绍相关图书目录，并特意请我品尝那里醇香浓郁、价廉物美的咖啡，令我十分感动。那次罗马之行，成果丰硕，发现了不少尚未有人研究的新史料，包括白晋 (Joachim Bouvet) 的《易经》研究手稿、杭州教徒张星曜的史料、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汤若望的《天文历法》等刻本。

我后来依据这些发现，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98年4月，应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教授郎宓榭 (Michael Lackner) 先生之邀，参加“欧洲与中国”会议，得以和白先生、马西尼先生再次在柏林相会，并结识多位学界前辈。

白先生是十分多产的学者，也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不仅精通拉丁文古典文献，在中国文学史、明清史、基督教史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尽管因为语言的关系，他的论著我阅读得不多，但他的多篇论著，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狮子在北京》(“A lion in Peking: 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 应该算白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中外关系史的名作，体现了他的深厚功力和博学多识。因为我主要研究康熙时代，得知此文后，很感兴趣，就写信向他索要，他马上把文章寄给我。

《狮子在北京》令我常读常新，受益匪浅。此文分析了葡萄牙进贡“百兽之王”的故事。白先生不仅参考了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明史》和《澳门纪略》中的材料，还查阅了不少清人文

集，包括李澄中、王鸿绪、尤侗的“西洋贡狮子赋”（《西堂杂俎》），这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无疑是十分费时的工作。在文中，白先生回顾了葡萄牙贡狮之前狮子传入中国的故事，引用了德礼贤 (Pasquale D' Elia) 在《利玛窦全集》(Matteo Ricci) 1596年在北京与两位贡狮的“回回”见面的故事，也提到了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十分稀见的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关于狮子的记载。接着对利类思的《狮子说》(1678) 进行了详细的翻译和介绍，还对《狮子说》的可能来源做了推断。此外，白先生还引用了陆次云《八译译史》，以及清代小说《聊斋志异》、袁枚《子不语》关于暹罗使节、西洋贡狮的故事，还提到了纪昀《如是我问》的材料，这些都体现了白先生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熟谙。关于葡萄牙和贡狮的故事，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文章发表，能为白先生的大作续貂。

对中国读者来说，白先生影响最大的著作，当推他与马西尼先生合写的《意大利与中国》一书，此书综合正史、志书、文集、游记等中西文第一手史料，从跨文明和全球史的视野，对意大利与中国两千年文明互鉴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系统全面的描述。全书融会贯通，文字优美，行文深入浅出，叙事生动活泼，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驾驭史料的才能，是作者在中西关系史领域长期耕耘的成果结晶，已成为中西文明交流史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白先生对曾经在杭州生活过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倾注了大量心血，整理出版了《卫匡国全集》，并发表了多种研究论著，听闻这些成果即将被译成中文发表，这将是嘉惠中文世界的大好消息。白佐良先生成就的取得，与他多年收集的丰富藏书有关。2019年初，我有幸得到马西尼先生的帮助，访问罗马大学，亲眼目睹和利用白先生丰富的收藏，抚摸先生的藏品，就像亲眼见到先生，在其书房朝圣，令我感动不已。

阅历丰富的白佐良先生，作为职业外交家，在东亚工作长达三十年之久。他早年在南京和香港工作，之后在东京担任外交官，后来担任意大利驻韩国、越南和菲律宾大使，直至1981年回到罗马，在罗马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白先生不仅精通欧洲文学，对罗马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和明清耶稣会士的研究也有精深的造诣，他著述宏丰，多有创见，其成就代表了20世纪意大利汉学乃至欧洲汉学的最高水平，依我的浅见，他是和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1921—2018)、许理和 (Erik Zürcher, 1928—2008) 先生鼎足而立的三位20世纪下半叶最为杰出的、影响最大的研究中关系史的欧洲汉学家，其成就将被全世界的学者永远铭记。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清代沈谦作赋，盛昱录《红楼梦赋图册》之“滴翠亭扑蝶蝶”
现藏爱尔兰切斯特·贝蒂图书馆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庸，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句话不仅适合文章创作，也适合理论研究，不仅适合古代，也适合当下。由于中国小说研究之悠久与研究人员之众多，“新变”的难度也不断被抬高。这是中国小说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学术挑战。

新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下简称《小说文体史》) 一书著者谭帆教授成名于古代戏曲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古代小说理论与小说文体研究。我和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重点虽然不同，但研究理念颇为契合。我多次提出，要回到中国文体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谭帆也主张“回到中国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当务之急是还原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回归中国传统的小说语境。

从中国古代文体的角度看，古代小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文体。西学东渐以来，小说文体刚好符合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体分类，所以小说毫无疑问地具有合理性和独立性。但如果按新文化以来形成的四大文体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类法，中国古代的诗歌、戏剧的形态最为明显，不难辨体。散文略为复杂，但若用“文章”概念来代替，辨体也是清晰的。问题在于，西方小说文体内涵与中国小说文体实际相差很远，所以“小说”文体研究反而变得复杂。二十世纪以来，用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和以“西”律“中”的价值标准来研究中国小说史，是一个相当突出和普遍的现象，并造成一些困扰。

那么，如何回到“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呢？所谓“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即尽量还原古代小说之“实际存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价值标准之“本土化”，即在借鉴外来观念和办法的同时，努力寻求蕴含本土文化之特性和符合本土“小说”之特性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从而实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小说文体史》力求用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和价值观去理解和把握古代小说文体。主张要以贴近“古人”、贴近“历史”、贴近“文体”自身为原则，努力寻求“本土化”的探究方法和“西学”的本土化路径，理论梳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小说”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过程，其指称对象错综复杂，包括“小道”“野史传说”“表演伎艺”和“虚构的叙事散文”等多方面内涵，大体呈现出“历时态”的流变线索，体现了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化进程；同时，“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小说”观念的演化主要是指“小说”指称对象的演化，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不断“更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如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小说”一直沿用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即与《汉书》一脉相承。所以，《小说文体史》认为，“总目”所框定的“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的著述和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被同置于“小说”的名下。此一特性即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史语境中的“本然状态”，也是《小说文体史》所强调和遵循的历史传统。

受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现代小说理论往往将小说理解为虚构的叙事文学文体。如果仅用这一概念衡量中国古代小说，至少是不普遍适合的。如程毅中先生在谈到《酉阳杂俎》时，指出此书“内容很杂，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算作小说”（《唐代小说史》）。可在古人的观念中，《酉阳杂俎》非但非小说，更是“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魁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小说文体的古今差异，的确值得关注。如按西方小说定义，在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与章回体四种文体中，多数的笔记体是不能列在“小说”之内的。因

吴承学

为它往往既非虚构，又不叙事。但笔记体小说是中国古代数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文体，也是俗文体中的最为高雅的文体。

对“叙事”的狭隘理解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与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与“叙事”背后蕴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远。《小说文体史》的研究表明，“叙事”内涵在中国古代非常丰富，不是“讲故事”所能限定的。就“事”而言，有“事体”“事件”“事情”“事由”“事类”“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含“记录”“叙述”“解释”“罗列”“说明”等多重理解。《小说文体史》回到中国小说语境，讨论叙事，强调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多元属性，尤其强调笔记体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文体的特殊叙事特性。这种研究以多元化与特殊性的眼光，以变通与圆融的方式，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内涵与表达形态，尤其为中国古代大量的笔记小说争得了文体分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在小说文体学上，是一个理论拓展与贡献。

《小说文体史》给我的启发甚多。我对中国小说文体也曾有过粗浅思考，一直有点疑惑：中国小说存在很多表现博闻或情致的率意记录，未必与叙事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小说的语境中，可不可能存在不“叙事”的中国小说呢？我们仍以笔记小说为例。

从《世说新语》书名来看，它所关注与表现的重点是“说”与“语”，其中有些篇目，如“言语”篇就明确标示其重点在记录人物言语。“何平叔(晏)云：‘服五百石，非唯清朗，亦觉神明开朗。’”“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这两则文字都非常简短，只记人物的言语。这种情况在《世说新语》其他篇目中也是大量存在。如《赏誉》篇：“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这两则简短的小说文本也仅仅言，一定要用“叙事”去解释，会显得有些牵强。除非我们把所有文字记录都解释为“事”的一部分，凡所记录，无非叙事，那反而证明西方的小说概念仍适用于中国古典小说文体。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形态的多元性与特殊性之外，也许更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自身的特性和演化。

学术创新，往往不是填补空白，而是对已有研究的开拓。如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的插图与评点已有足够的讨论，《小说文体史》却将它们纳入小说文体研究范畴之中，认为对小说“文体”的理解，应该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从文本的叙述实践、叙述的有效性等角度来观照小说之“整体”，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全部的小说文本(包含正文、插图、评点等)之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插图与插图，虽分别具有文本批评与美术特性，但本质上仍是与小说正文融于一体的、供读者阅读的小说文本，而非游离于小说之外的附属。

华东师大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光华大学期间，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撰述了小说史《宋代文学·宋之小说》、小说理论《小说丛话》等作品。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以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代有人才，迄今为止，大致可以分为四代：徐震堉、施蛰存先生等前辈学者为一代；陈康、谭帆、竺洪波、程华平等学者为一代；刘晓明、王庆华等学者为一代；可以说，这部《小说文体史》既凝聚了谭帆教授师徒两代学者的心血，也积淀了前辈的优秀传统。（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回归『本土』立场的尝试

再寻黄绾 《中国哲学大辞典》的误笔

张宏敏

黄绾，一位生活在15、16世纪的浙江台州府黄岩县（一作太平县）人。作为政治家的黄绾在《明史》有传，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先后四次出仕、三次请归、一次“闲住”，往来于台州与两京（京师、南都）之间。他因参与了嘉靖三年的“大礼议”并极力主张“继统不继嗣”、作为钦差抚勘过“大同兵变”而受到嘉靖帝的赏识与信任，又因晚年出任正使、出使安南未行而罢官。

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黄绾，《明儒学案》中辟有专条这样介绍他——“学富五年，志在天下，一生以学‘圣人’之学而‘明道’为己任，青年时期师从浙南理学家家谢铎并刻苦用功于程朱理学，中年时与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家结盟共学，曾服膺于王阳明‘致良知’教并创办石龙书院，致力于在浙南一代传播弘扬阳明心学。阳明殁后，多次上疏为阳明争取‘名分’，撰有《阳明先生行状》，辑刊《阳明先生存稿》，还嫁女于阳明哲嗣王正亿并抚养其长大成人。晚年‘闲住’黄岩，隐居翠屏山，以读书、著书、讲学终老，并能自觉地开展对宋明诸儒学术思想的批判，进而明确提出具有自家特色的‘良止执中’之学，可谓中晚明时期‘王门’内部自觉修正‘王学’的先驱人物。”

对于黄绾这位明代浙中王门的杰出代表与阳明后学的关键人物，目前网络搜索引擎以及公开出版物对其生卒年份、表字、职官等基本资料是怎样描述的呢？先看《中国哲学大辞典》(方克立主编, 1994) 这部工具书中“黄绾”辞条的描述：

黄绾 (1477—1551) 明学者。字叔贤，号允庵，石龙。黄岩（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以祖荫入官，授后军都事，历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南京工部员外郎、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为学初师谢铎，宗程朱，继师王守仁。后对王学有所批评。……尖锐批评王学和禅学的“无思”“无为”，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禅学益盛，实理益失”（《明道编》）。有《石龙集》《明道编》。

网络搜索引擎对黄绾生平学行的介绍大多类似。其实，只要我们按照当代史学家陈垣先生倡导的“史源学”研究路径，稍微检索一下《明史宗实录》、明清两代学者文集及近现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会发现这些对黄绾的描述有不少误笔之处。

关于黄绾生卒年，除《中国哲学大辞典》给出的“1477—1551”，还有两种观点：“约1477—约1551”和“1480—1554”。无论哪一种，对黄绾享年75岁的提法没有怀疑。明代学者李一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行状》、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黄宗贤先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尚书黄久庵先生传》均记黄绾“享/卒年七十有五”。三是黄绾著《石龙集》卷二十五《五弟宗哲墓志铭》文，提到黄宗哲“小子(黄绾)十岁”，而宗哲“生于弘治庚戌(1490)正月十五日”系黄绾亲书，据此可推知黄绾本人生于1480年无疑。

据《中国哲学大辞典》提到黄绾的表字是“字叔贤”，网络搜索引擎有“字宗贤，又/一字叔贤”的提法。“字叔贤”的始作俑者系黄宗羲。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尚书黄久庵先生传》作“字叔贤”。勘对目前存世的各种文献，可以得知，黄绾的表字只能是“宗贤”而非“叔贤”。诸如，与黄绾系亦师亦友关系的王阳明，写给黄绾的书信均作“答黄宗贤”“与黄宗贤”“别黄宗贤”，检索整部《王文成公全书》，根本没有“黄叔贤”的称谓。“方叔贤”的称谓倒是有一些，可“叔贤”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的表字，则属于方献夫(1485—1544，初名献科，号西樵，广东南海人)而非黄绾。又，王阳明早期门人徐爱在与黄绾的诗词唱和中也用“宗贤”的表字，比如《和友人黄宗贤漫兴二绝》《送黄宗贤谢病归天台》等诗题中就称“黄宗贤”而非“黄叔贤”。王廷相《王氏家藏集》涉黄绾处，亦多用“黄宗贤”语。黄绾诗文集《久庵先生文选》诸卷首，均标识有“黄岩黄绾宗贤甫”的字样。可见，黄绾表字“宗贤”系事实。早在黄宗羲《明儒学案》(成书于

清康熙年间)撰“黄绾传”之前，明代中后期两位学者：李一瀚的《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行状》、徐象梅的《黄宗贤先生传》，均记到黄绾的表字“字宗贤”。至于《明儒学案》黄绾“字叔贤”之误撰，系黄宗羲本人疏忽所致，抑或后世刊行《明儒学案》时误刻所致，则有待详考。

《中国哲学大辞典》辞条在介绍黄绾的“官位时，以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或曰‘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而笔者在《明史》《明世宗实录》中检索黄绾官衔时发现，黄绾所授礼部尚书实系“京师”即北京的“礼部尚书”而非“南京礼部尚书”。

黄绾如何官至“礼部尚书”，《明史》有详细记载，比如卷一七《世宗本纪一》：“(嘉靖)十八年春二月，……起黄绾为礼部尚书，宣谕安南。”卷一百九十七《黄绾传》：“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诏及皇祖庙号，请遣官诏谕朝鲜。时帝方议讨安南，欲因以观之……特起绾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为正使。”

黄绾挚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中交待撰写缘由时，称黄绾为“礼部尚书”并非“南京礼部尚书”：“甘泉子掣家闭关于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即王阳明)王子正亿，以其岳舅礼部尚书黄久庵公之状及书来请墓铭。”此外，黄绾本人为先师谢铎《桃溪类稿》所作“序”文末了署名即云“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径言“礼部尚书”，而不加“南京”二字于前。《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壬寅”条“黄绾传”在记录黄绾曾任官衔时，亦提“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如上所举数条材料足以说明，黄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提法系误笔，应予纠正。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学林

清康熙年间)撰“黄绾传”之前，明代中后期两位学者：李一瀚的《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行状》、徐象梅的《黄宗贤先生传》，均记到黄绾的表字“字宗贤”。至于《明儒学案》黄绾“字叔贤”之误撰，系黄宗羲本人疏忽所致，抑或后世刊行《明儒学案》时误刻所致，则有待详考。

《中国哲学大辞典》辞条在介绍黄绾的“官位时，以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或曰‘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而笔者在《明史》《明世宗实录》中检索黄绾官衔时发现，黄绾所授礼部尚书实系“京师”即北京的“礼部尚书”而非“南京礼部尚书”。

黄绾如何官至“礼部尚书”，《明史》有详细记载，比如卷一七《世宗本纪一》：“(嘉靖)十八年春二月，……起黄绾为礼部尚书，宣谕安南。”卷一百九十七《黄绾传》：“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诏及皇祖庙号，请遣官诏谕朝鲜。时帝方议讨安南，欲因以观之……特起绾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为正使。”

黄绾挚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中交待撰写缘由时，称黄绾为“礼部尚书”并非“南京礼部尚书”：“甘泉子掣家闭关于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即王阳明)王子正亿，以其岳舅礼部尚书黄久庵公之状及书来请墓铭。”此外，黄绾本人为先师谢铎《桃溪类稿》所作“序”文末了署名即云“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径言“礼部尚书”，而不加“南京”二字于前。《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壬寅”条“黄绾传”在记录黄绾曾任官衔时，亦提“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如上所举数条材料足以说明，黄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提法系误笔，应予纠正。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